

四川博物院 主编

英和之光

——辛亥秋四川保路死事百年祭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護照

共 和 之 光

四川博物院 主編

欽差出使日本國大臣兼管海軍總監督李 為

發給護照事茲有學士龍鳴劍四
國事有軍刀上 槍等件並隨身行李合行發
給護照為此照仰沿途經過關津口卡立

不得留難阻滯須一覽者
沿途經過關

——辛亥秋四川保路死事百年祭

光緒三十四年正月

欽差大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和之光：辛亥秋四川保路死事百年祭 / 四川博物院主编；袁庭栋撰.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408-5607-6

I. ①共… II. ①四…②袁… III. ①保路运动-史料 IV. ①K257.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1888号

封面题签	何应辉
章题书写	易 风
责任编辑	苟世建
封面设计	何一兵
版式设计	王 凌
责任校对	左倚丽
责任印制	黄 萍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制 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成品规格	190mm × 260mm
印 张	23.5 插页 4
定 价	8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调换。电话：(028) 86259359

营销电话：(028) 86259477 邮购电话：(028) 86259694

编辑部电话：(028) 86259381

谨以此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保路运动一百周年

《共和之光——辛亥秋四川保路死事百年祭》

编委会

主 任：王 琼

副 主 任：盛建武 雷 华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张纪亮 陈志学 苟世建 胡宇红 袁庭栋

谢志成 魏学峰

执行主编：盛建武

正文撰稿：袁庭栋

插图说明文字撰写：

张 蓉 彭代群 辛 艳 郭军涛 刘 敏

李 媛 巫雨静 蔡 琦 成 吟

配图及文字编辑：

袁庭栋 辛 艳

文物摄影：余 波

CONTENTS 目录

沉痾 001 ~ 056

风雨飘摇	003
多元的新潮	008
新政还是新衣	012
革命与立宪的比拼	018
四川，又一次成为矛盾的焦点	024

铁路 057 ~ 080

铁路这件新鲜事	059
冲突与融合	062
“官督商办”模式的形成	073

微澜 081 ~ 154

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	083
留学生提出全面方案	097
从官办到商办	102
利涉全川的“民股”	113
收归“国有”	126
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	140



大波 155 ~ 238

同志会的迅猛发展	157
宣传浪潮涌城乡	175
“和平保路”的路不通	181
向同志会背后杀来的几刀	190
转折关头的特别股东大会	200
从罢市罢课到抗粮抗捐	217
底层的“暴动”和上层的《川人自保之商榷书》	227

首义 239 ~ 354

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与罗泉井会议	241
“成都血案”点燃燎原烈火	256
全川处处同志军	265
荣县独立	282
岑春煊与端方奉命入川	288
重庆军政府的成立	301
四川军政府的成立	318
重庆蜀军政府和四川军政府的合并	346

尾声	355
----------	-----

后记	367
----------	-----

共和之光

辛亥秋四川保路死事百年祭

沉疴



风雨飘摇

公元1903年，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农历岁次癸卯。

这是清王朝的第259年，距清王朝垮台只有8个年头，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帝王专制政体结束之前的最后8个年头。

这一年，50岁的蒙古镶蓝旗人锡良受清皇室的重托，从热河都统任上调任四川总督，到达成都，接替曾一度被赞誉为“能臣”的岑春煊，企图安靖地方，推行新政，挽王朝之危难，扶大厦之将倾。

锡良眼前的四川，不再是一方物阜年丰、丝管纷纷的天府之国，而是一个危机四伏、处处烦心的荆棘之地。别的不说，只说眼前的一件大事：1902年9月14日晚，出身于今天四川金堂刺笆店的四川义和团起义军最高首领、年方16岁的女英雄廖九妹（当时被尊称叫“廖观音”）率领一支小分队攻入成都，直扑督院街。可惜小分队兵力太少，未能攻入总督衙门，否则很可能就会刀劈总督奎俊。奎俊保住了一条命，但总督可当不成了。清王朝任命的新任四川总督岑春煊在9月25日即飞速上任，三天之后就在成都北门外的昭觉寺摆开刑场，一次诛杀义和团官兵百余人。然后在全川进行疯狂镇压，使用保甲连坐制大肆屠杀，并在1903年1月15日将“廖观音”杀害于成都。但是他的屠刀并未能使四川的社会安定，反而激起了更大的不满，一年之后即被调离四川，这才有了锡良的入川。岑春煊在蜀中一年，间接留给后人的最有名的遗物在今天成都武侯祠中，这是他昔年的老师赵藩送给他的。因为赵藩对他的屠杀实在看不下去了，认为在民怨沸腾的年月无异于扬汤止沸，于是就在武侯祠诸葛亮殿前写下如下一副对联请他观看，用以劝诫。这副对联就是如今名满中华的《攻心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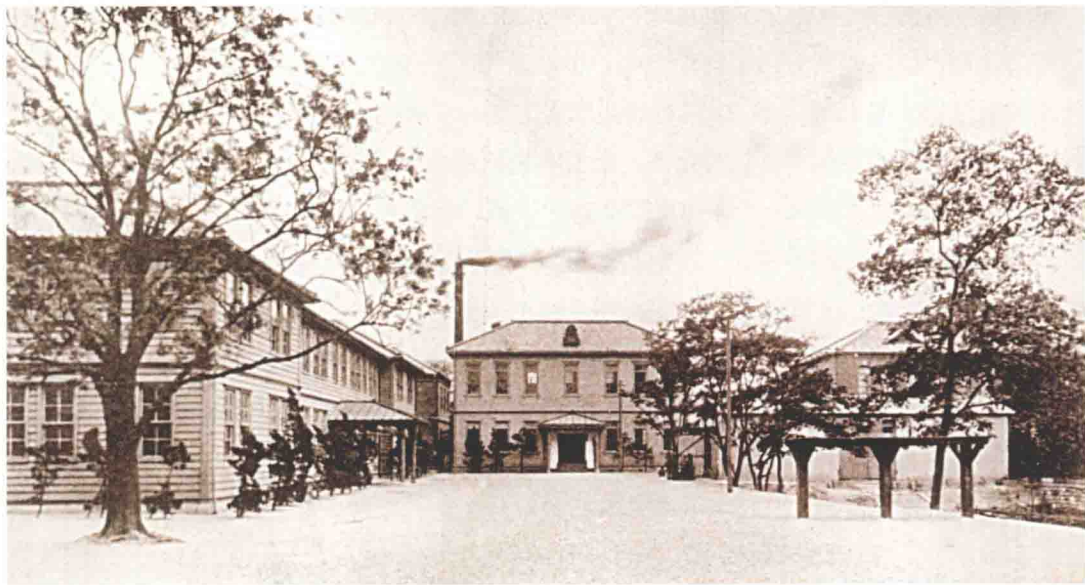
也就在这一年，25岁的四川荣县青年吴玉章告别了妻贤子幼的故园，怀抱救国图强之志，东出夔门，去日本学习救国本领，结识天下豪俊，准备改天换地，再造中华。他说：

“我需要找寻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船过三峡时，他写的《东游述志》有如下的诗句：“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赴日留学以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是当时的一股全国性潮流，一方面因为与我国相邻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之路，国力日益增强，特别是甲午战争之中以大约只有中国人口十分之一的一个蕞尔小国而大败中国，对中国的各阶层人士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与吸引力，毛泽东就曾经说过，“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习”，吴玉章在回忆中也说，“总觉得中国应该学习日本”。故而有大量的有志青年前往日本留学。另一方面也因为清王朝为了推行废科举、兴学校的“新政”，鼓励留学日本，不仅有具体的奖励措施，还有一定的官费名额。



▲青年吴玉章
四川博物院提供



▲川籍留日学生读书的学校之一——日本大阪工业学校旧址 四川博物院提供

连清末最著名的大臣张之洞都认为“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事半功倍，无过于此”。中外的研究者几乎都认为，“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它产生了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代领袖。”这其中当然包括四川。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先后赴日留学的四川青年愈来愈多。中国政府向日本派出留学生最早是在1896年。四川的官派留学生最早是在1901年，当年共派出了22人，其中有6人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包括日后在四川的风云人物胡景伊、周道刚和徐孝刚。这以后留学日本的人数逐年增多，1903年为57名，1904年为332名，1905年为393名，1906年为800多名，据吴玉章的回忆，在日本的四川留学生“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在全国各省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中，位居西部的四川仅次于湖北、湖南、江苏、直隶、浙江之后，名列第六。在这段时期，四川还向美、英、法、德、比等国派出了少量的留学生。如此之多的四川学子“联翩东游”，于“川省朴茂之区，一时顿演此奇观”。在这“奇观”之中，甚至还有少数女性。四川历史上第一批学习与运用西方近代文明的人才主要从这个群体之中产生，清末民初四川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大多数都出现于这个群体。这其中，有比吴玉章早一年赴日的邹容，和吴玉章同年赴日的张澜与熊克武，还有比吴玉章晚一年赴日的蒲殿俊与尹昌衡。他的这几位同道，正是辛亥前后蜀中风云中最重要的历史人物。

面对眼前的清王朝专制政权这个庞然大物，以入川的锡良为代表的人群想挽救，以出川的吴玉章为代表的人群想推翻。

是不是能挽救？用什么办法挽救？

是不是能推翻？用什么办法推翻？

这就是当年摆在四川各阶层人士面前最为紧迫的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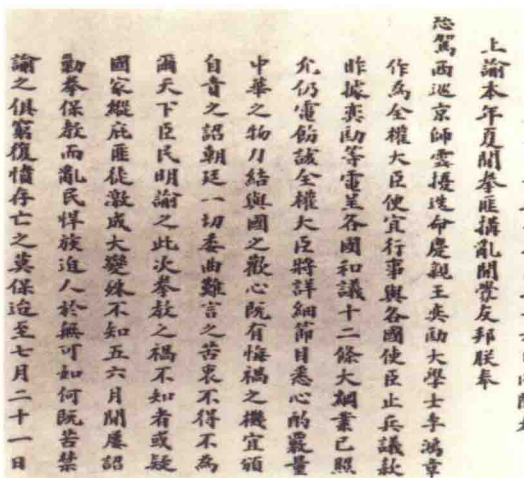
放眼国中，几近垂暮之年的大清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百孔千疮。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彻底地摧毁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狂妄与自尊，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不得不订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以后又沿战败者之颓势，被迫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和《中俄伊犁通商章程》。从此开始，乾隆时期的“十全武功”之类的陶醉一去不返，社会上层的皇族高官们怡然自得的美梦做不下去了，社会底层士农工商们安然自乐的小梦也做不下去了。

1851~1864年的太平军和与之相伴而起的捻军，还有贵州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族起义，四川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西北的陕、甘、宁、青四省的回族起义，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打得七零八落，摇摇欲坠，让清王朝的上层官员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自信，让满蒙八旗军队的威力在人们心目中荡然无存。



▲《马关条约》签订之情景 四川博物院提供



▲1901年2月14日清廷关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 四川博物院提供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在战败之后与英、法、俄、美4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与英、法、美3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紧接着，就为一个换约的地点问题，英法联军竟然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惨剧就是在这时发生的），逼迫清王朝分别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与此同时，俄国还逼迫清王朝承认了《璦琿条约》，签订中俄《北京条约》。

从此以后，清王朝在所有外交事务中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屈膝于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列强要其赔款就赔款，要其让权就让权，要驻兵就驻兵，要割地就割地。1860年俄国政府在未打一枪的情况下，只是趁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有利时机，就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逼迫清政府签订由俄国政府单方面炮制文本、单方面绘制边界地图的中俄《北京条约》，而且规定“一字不能更易”。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甲午战争”爆发，虽然有很多将士英勇杀敌，血洒疆场，但是清王朝的军队在陆上与海上双双大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的结果，是签订了历史上罕见的、《南京条约》以来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名副其实的卖国条约不仅条条款项有如利刃毒针，甚至连中方派出的谈判签约代表也得由日本指定。

在清代后期，单是清王朝如何卑躬屈膝地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

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就可以写一本大书。什么叫“弱国无外交”，这一时期的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入侵我国的严重后果，四川的舆论界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1898年出版于重庆的《渝报》第三册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很概括的话：“英专我利权，俄执我兵枢，法管我船政，德据我铁路，中国脂膏，若辈所饮啄也，天下郡县，外人之传舍也。”

面对着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一次次地入侵我国的领土，逼迫着清政府割地赔款；面对着帝国主义的势力一步步地渗透我国的内地，控制与掠夺经济资源，从鸦片战争开始，不甘受宰割与奴役的中国人民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斗争，反侵略、反控制、反瓜分、反掠夺，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各地多次发生的以反“洋教”为中心的焚教堂、驱教士、打教民的“教案”。这些“教案”的主要力量是各地的掌握了一定武装力量的民间会党，如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山东的大刀会、热河的金丹道、广西的天地会等，最后发展为1898年在山东大爆发的以“扶清灭洋”为号召与目的的义和团运动。结果造成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企图利用义和团以火中取栗的慈禧太后仓皇出逃，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并劫掠京津地区，俄国侵略军攻占东北各主要城市。结果是11个帝国主义国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清代历史上可谓丧权辱国之最的《辛丑条约》，单赔款就是45000万两白银。

历史证明，用中国古代社会民间会党的联络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既不能“扶清”，也不能“灭洋”。

历史也再一次证明，清王朝已经抱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信条并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虽然还保留了皇帝与朝廷，但是已沦为帝国主义的“儿皇帝”和“洋人的朝廷”。

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将清王朝“太平盛世”的外衣一层层地被剥了个精光，妄自尊大的呓语一次次地被粉碎，处处痼疽的肉身愈来愈清楚地表露无遗。

此时此刻，无论朝野，无论官民，对于所有头脑清醒的人士来说，其结论是惊人的相似：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沉疴难起，危在旦夕！

多元的新潮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的思想学说与物化成果逐渐传入中国。在经过了反复的抗拒、抵制、接触、比较之后，一件一件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改变了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态度：洋枪比大刀利害，机器比牛马力大，火车比骡车舒适，电报比驿传快速，西医比中医有效，照相比画像逼真，染料比蓝靛经久，火柴比火镰方便，洋布比土布细密，钟表比日晷准确，铅印比刻版便捷……过去被视为“奇技淫巧”的西洋玩意儿渐渐被上至慈禧太后、下至平民百姓的国人所接受，所欢迎。抱着不同目的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活下去，上述的这些现实情况是对他们重要的支撑。

这是中西文化在长期冲突、碰撞、交融之后的必然结果，这是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国逐步传播之后的必然结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世界影响精神世界，长期被儒家政治思想统治并禁锢的中国思想界不能不发生变化，一缕缕清新之风不断从九州大地吹过，一道道划破长空的闪电不时将仰望星空的人们惊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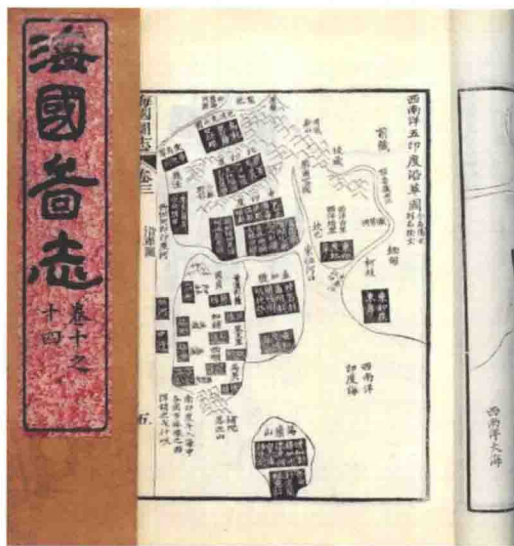
正是在上述这种背景之下，举国上下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认识到，旧秩序无法再维持了，旧套路无法再使用了，旧观念无法不改变了，旧事物无法不革新了。这时的中国成了一个“新”字满天飞的时代，一个“除旧布新”风潮处处可见的时代。

“新”是一个相对于“旧”的概念，内涵十分宽泛，“除旧布新”是一个古老的成语，最早见于先秦经典《左传·昭公十七年》。在清代后期，中国有着各种各样的“除旧布新”。

首先是对于新生事物最为敏感的一批知识分子中间的有识之士在说“新”。

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时期的诗人龚自珍（1792—1841年）将当时的社会称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他明确指出：“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他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提出了“更法”、“改图”的革新主张。

► 魏源的《海国图志》



较之龚自珍稍晚的思想家魏源（1794—1857年）提出了进一步的变法维新主张，特别是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点，介绍了有关蒸汽机、火轮船等西方科技成果的原理与制造方法，对于当时还相当闭塞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较之魏源稍晚的地理学家徐继畲（1795—1873年）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学习西方民主政体的大问题，他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继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早期革新派人士之后，一批支持或参与洋务运动的有识之士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有影响的维新思想家，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上提出了若干具体的、令国人耳目一新的主张。这其中，曾遍游法国、英国、日本并在英国与香港长期居住的王韬（1828—1897年），向国人介绍并比较了西方国家的“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制度之后，认为“君民共主”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掌握了英、法、希腊、拉丁语，曾出使法国、周游欧洲并在巴黎取得了博士学位的马建忠（1844—1900年），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三权分立”的学说与制度。曾经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的薛福成（1838—1894年），向国人介绍了英国的议会、两党制。曾长期任英商公司高级职员后又担任过多家洋务派实业负责人的郑观应（1842—1921年），则明确地认为中国应当实行议会制度。虽然他们都未能走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框，虽然他们都未能走出“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传统，但是他们这些令人振聋发聩的新说，他们对于保守顽固派种种“泥古不化”的言行的批判，对之后的政治局面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并不亚于洋务派所建立的新式工厂。

一次次的割地赔款，一年年的瓜分狂潮，对每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是一种民族觉醒的强刺激，洋务运动为中国的有识之士了解西方的近代文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为中国更多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学习与思考的空间。正是在王韬等人介绍了西方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教各方面情况，并公开提出“变法”思想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维新”运动以“变法”为中心而展开了，这就是在新的条件下更进一步地谈“新”求“新”的“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以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谭嗣同（1863—1898年）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们用了10年的时间，造舆论、写著作、办报纸、组学会、上书皇帝、提出改革方案……虽然有康有为的理论建设，有梁启超的如椽巨笔，有谭嗣同的慷慨激昂，甚至得到了清王朝权力中枢两派之一的光绪皇帝和“帝党”的一定支持而有过“百日维新”的变法实践。但是，在执掌朝廷大权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与强力镇压之下，强学会被强行解散，报纸被强行查封，一直到光绪皇帝被囚禁，维新派被搜捕，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全部被杀，“百日维新”中推行的“新政”措施除了开办京师大学堂这一项被保留之外，全部被取消。作为一次近代中国最有名的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既是“维新”浪潮的一个高峰，又标志着“维新”运动的彻底的失败，它以慷慨悲歌而告终，只是在当时的思想解放进程中产生过一定的推进作用。

清王朝的一些高官大吏也在说“新”，这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推行“自强新政”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最早倡导者中地位最高的是恭亲王奕訢，参与者与实践者中有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地方权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楨、丁日昌、郭嵩焘等。其目的是以“师夷长技”为中心，购买洋枪洋炮，制造洋枪洋炮，剿灭“内乱”，抵御外侮。经过30多年的努力，建立起了一批军事工业，培养了一批新式军队。但是，策划与实践“洋务运动”的洋务派的根本目的是在维护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故而连最顽固的慈禧太后都会给予一定的支持。洋务派们不会想到，正如给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配备最好的药物也绝不能挽救其性命一样，腐朽的清王朝也绝对不会通过建新厂、练新军就能“除旧布新”的。最佳的例证就是甲午海战：可谓集举国之力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共有大小战舰20多艘（这还不包括鱼雷艇与辅助船只），论装备水平是当时全世界相当先进的近代舰队之一，其实力绝不在日本海军之下。可是由于清政府在体制与管理上的腐败无能，结果是被日本海军打得全军覆没。甲午海战的惨败，从一个侧面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新政”完全不可能使中国“自强”。

不能忽视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也在说“新”求“新”，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早在1866年就提出了一篇著名的《新议略论》。他所说的“新”，是要求